

知覺歧視對同志伴侶關係適應的影響：拒絕敏感度的中介效果

王郁盛¹、劉彥君²

本研究旨在了解知覺歧視對同志族群伴侶關係的影響，以及拒絕敏感度在其中是否具有中介的效果。本研究以目前處於同性伴侶關係且年滿 20 歲的 293 位（117 位男性、176 位女性）同志族群為研究對象，透過網路問卷的方式蒐集資料。研究結果如下：1. 男性同志族群的知覺歧視與拒絕敏感度分數上比女性高，但關係適應分數則比女性低；2. 不論性別，知覺歧視與拒絕敏感度間均為顯著正相關，而知覺歧視與關係適應，以及拒絕敏感度與關係適應之間，僅在女性方面呈現顯著負相關，男性則未達顯著相關；3. 女性的拒絕敏感度在知覺歧視與伴侶關係適應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男性則不具有中介效果。根據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同志族群的知覺歧視經驗，會影響他們的人際互動模式，而在女性方面則可能會進而損害伴侶關係，亦即外在環境的壓迫可能會滲入傷害個體的私生活。因此在協助同志族群時，需敏感於社會文化造成的壓迫對他們人際互動上的影響，尤其女性方面，更需敏感於歧視經驗對伴侶關係的損害。

關鍵詞：知覺歧視、拒絕敏感度、關係適應、同志伴侶

¹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輔導室

² 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

通訊作者：劉彥君，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yencliu@utapei.edu.tw。
本研究改寫自第一作者部分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為劉彥君。感謝審查委員給予寶貴的建議，使本文能有更深入與多元的討論。

在生活中，同志族群至今仍面對著許多層面的歧視，且這些經驗往往從小累積而來，並在家庭、學校、職場或社會中被強化，形成他們的潛在壓力源，損害自我認同（Meyer, 2003），對身心健康造成負面的影響（Balsam & Mohr, 2007）。此外，他們可能易預期別人因自身性傾向的緣故而排斥自己，將這些互動經驗整合進自己的內在運作模式之中，導致過度詮釋別人的行為，或是敏感於他人的反應，並在被拒絕時產生強烈的情緒，強化自身拒絕敏感度，影響其人際互動（Downey & Feldman, 1996; Pachankis et al., 2008）。

在親密關係中，同志族群亦面對許多困境，Maslow（1943）的需求理論，或是 Erikson（1963）的心理社會發展論，皆可發現對個體發展而言，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的重要性，然而相較於異性戀者，同志族群在生活中因各種壓力，更難以探索、建立與發展親密關係，也容易花較多心力在避免受他人歧視，而非關注伴侶的情緒和需求上（Greene & Britton, 2015; Mohr & Daly, 2008），此外，過往的歧視經驗可能會導致高拒絕敏感度，使他們認為自己是不被看重或值得被愛的對象，進而在關係中容易有不安全感，也對他人有較多的猜忌與懷疑，若個體以這樣的內在運作模式與伴侶互動時，便可能會經常感到患得患失，導致強烈的情緒起伏或是爭執，並使伴侶關係受到損害（Downey & Feldman, 1996）。

由上述可知，同志伴侶在生活中需面對許多異性戀伴侶所無法體會的壓力，彼此的關係適應更承受著性污名與拒絕敏感度的衝擊。因此本研究想要探討歧視經驗對關係適應的影響，在國內是否存在著與他國同等的關聯性，並了解拒絕敏感度於其中所扮演的機制，一方面拓展社會對同志族群的了解，另一方面則從中探討身為助人工作者的我們，在面對同志族群或伴侶時，提供不同介入處遇的角度，更有效的予以協助。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有：1. 了解國內同志族群的知覺歧視、拒絕敏感度與關係適應之現況。2. 了解同志族群的知覺歧視、拒絕敏感度與關係適應之關聯。3. 探討同志族群的拒絕敏感度，在知覺歧視與關係適應間的中介效果。

（一）拒絕敏感度對同志族群的影響

1. 拒絕敏感度的內涵與測量

Downey 與 Feldman（1996）在整合了依附理論、內在運作模式及認知—情緒處理系統（cognitive-affective process system, CAPS）後，提出了拒絕敏感度（rejection sensitivity, RS）此一概念，意指當個體在尋求他人接納或支持時，會產生一種焦慮性的預期心理（anxious expectation），傾向認為自己會被他人拒絕，或在曖昧不明、中性的情境中，容易將對方的行為與態度解釋為拒絕訊息，並且在感受到被拒絕之後，產生過度且強烈的情緒與行為反應。

拒絕敏感度會受到個體的成長經驗所影響，當個體在童年或成長的過程中，自身的需求不停被重要他人（如家人或同儕）所拒絕時，會影響個體在日後看待自己、他人與關係的角度及方式，尤其是針對自我而非行為方面的負面態度時，會更讓他們自覺自己是不好、丟臉且不值得被愛的，並發展僵化且不合理的人際互動方式與詮釋，認為當自己向他人尋求接納與支持時，有很高的機率會被拒絕、傾向認為他人對自己懷有惡意，強化自身的拒絕敏感度，並產生強烈的情緒、憤怒、焦慮或敵對的情緒，並藉由過度控制或攻擊行為來獲得掌控感，或是對他人冷漠或切斷情緒支持，以阻斷被拒絕的痛楚。然而不論被激發何種情緒或行為，皆會破壞個體與他人的關係（Downey & Feldman, 1996; Feldman & Downey, 1994; Rohner, 2004），其中男性相較於女性而言，更容易接收到同儕的負面訊息，使他們對外在的拒絕訊號更加敏感（London et al., 2007; Marston et al., 2010）。

在測量方面，由於拒絕敏感度理論基礎之一為期望價值理論（expectancy-value theory），Fishbein（1963）認為個體對外在事件的態度或因應方式，會受到他們對事件的信念、想法與預期，以及對於事件結果的評估所影響；亦即我們在與他人的互動過程中，會不停評估與揣測行為的結果，以及此結果所帶來的情緒反應，藉以決定我們對他人或事件的態度。對此，Fishbein 認為個體的態度為對事情的信念與預期，以及對事件結果的評估兩者之相乘積，並提出下列之公式：態度（attitude）= 信念（belief）× 評估／價值（evaluation/value）。隨後 Downey 與 Feldman（1996）依據此理論之模型，發展了拒絕敏感度量表，藉由測量個體在面對各個情境時的焦慮程度與負向期

望程度，以了解參與者的拒絕敏感度，本研究將以此量表為此次測量工具。

2. 同志族群的拒絕敏感度

Mendoza-Denton 等人（2002）發現少數族群容易因為自己的身分認同（如性別、種族、性傾向等）受到歧視或污名，更頻繁且強烈的感受到被拒絕和冷落的經驗，在與他人互動的過程，因害怕被歧視或拒絕的擔憂，使他們傾向預期外團體成員會對自己持有負面的態度及互動模式，進而激發對身分認同的拒絕敏感度，產生更多的警覺性與強烈的焦慮感，亦較不易信任他人與尋求幫助，也不願與主流群體有所交流（Feinstein, 2020; Rostosky & Riggle, 2017）。由此可見，同志族群會經歷到有別於其他群體的壓力，而透過 Meyer（2003）的少數族群壓力模型（minority stress model），以及 Hatzenbuehler（2009）的心理中介模型（psychological mediation framework），可協理解該族群的特殊壓力源，以及其影響個體身心健康的歷程。

Meyer（2003）的少數族群壓力模型（minority stress model）提出相較於一般壓力源，少數族群壓力包含了「獨特性」、「長期性」與「源於社會」此三個特性，亦即這些壓力是該族群特有的，且長期存在於社會架構或文化體系之中的歧視與偏見。這些壓力源對少數族群的影響從遠端（distal）到近端（proximal）涉及了四個因素：外在的壓力源或歧視、對此壓力的預期和警覺、內化恐同與隱藏自身性傾向（Meyer, 1995; Meyer & Dean, 1998）。由於社會對同志族群的壓迫，使他們在生活中不停的經驗到相關的壓力源，並對這些事件有較高的警覺與敏感度，在個體的過度警覺與社會壓迫的交互作用之下，便可能導致同志族群擔心自身受到影響與傷害，進而刻意避開或隱藏自身性傾向以自我保護，但同時也內化了社會對同志族群的負面態度，隨後個體因更易擔心自己受到排擠而對外在壓力更加敏感，並不停強化內化恐同的程度，形成惡性循環。

Hatzenbuehler（2009）的心理中介模型（psychological mediation framework），亦幫助我們理解這些壓力源如何損害同志族群的身心健康，其認為當同志族群經驗到歧視時，會因為他們所採用的因應策略、情緒調節能力、與他人的互動情形以及認知資源等狀況，影響到他們的心理健康。隨後 Feinstein（2020）整合上述理論與過去研究，並納入拒絕敏感度的概念，發現這些受歧視的經驗，會使個案容易預期自己被拒絕並感到焦慮，而他們對環境的解讀，對自身後續經驗、反應與身心健康亦扮演重要的角色。由此可知，高拒絕敏感度雖幫助個體避免受傷，卻可能損害到身心健康（Pascoe & Smart Richman, 2009），對此，Romero-Canyas 等人（2010）以個體的防禦機制（defensive motivational system）來解釋，指出拒絕敏感度具有自我保護的功能，讓個體能預先對威脅訊號保持警覺，並事先避開危險與被攻擊的可能，然而若在任何情境下皆保持警覺態度時，則容易因過度在意被拒絕或避免受傷，而忽視其他安全訊號，進而影響身心狀態。

由上可知，當同志族群過往因性傾向的緣故，接收到太多被拒絕的訊息與經驗後，便會使他們預期並擔心他人會因自身的性傾向而拒絕自己，導致過度的自我審查、對污名化更加敏感、較高的社會焦慮與被評價的恐懼，並耗弱他們對社會支持的滿意程度（Hetrick & Martin, 1987; Pachankis & Goldfried, 2006; Pachankis et al., 2008; Safren & Pantalone, 2006）。因此，國外學者在探討該族群的拒絕敏感度時，大多僅針對和性傾向有關的情境做探討，但本研究假設，根據拒絕敏感度的理論基礎，同志族群往往因性傾向的緣故，自幼與社會化的過程中，更易接收到對同志的排斥與嫌惡，或在成長歷程中遭遇許多被他人拒絕的經驗，使他們更易預期別人會排擠與冷落自己。長期下來便可能逐漸整合進自身的內在運作模式之中，傾向認為他人會拒絕自己的需求，同時容易過度詮釋他人的反應，並在感受到被拒絕時，引發強烈的情緒反應。綜上所述，本研究假設個體從小因性傾向而受到歧視的經驗，可能會影響他們與別人互動的認知基模，導致他們即便在一般的人際互動情境中，亦會擔心與預期自己的需求被他人拒絕，而有較高的拒絕敏感度。

（二）知覺歧視作為同志族群的遠端壓力源

透過 Bronfenbrenner（1977, 1979）的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可以了解污名與歧視對個體的影響。社會對同志族群之性污名或是不平等的法律體制，會透過傳播媒體，或是社區資源的運用，影響到大眾對該族群的看法，並增加歧視發生的可能性，隨後當同志族群的重要他人、同儕或同事等人吸納了這些偏見與負面觀感後，便可能難以接納個體的性傾向，進而可能對

他們產生壓迫，並影響到彼此之間的互動方式，與同志族群的身心健康。而由於每個人對於歧視的感受與認定有所不同，所造成的影響程度也會有所差異（Lazarus & Folkman, 1984），且主觀的歧視經驗相較於客觀的歧視事件而言，對個體的影響力更加深遠（Paradies, 2006），過去學者將這些主觀經驗稱之為知覺歧視（perceived discrimination），亦即個體主觀感受與認定的歧視經驗之頻率（Schmitt et al., 2014）。

根據 Feinstein（2020）的模型，這些遠端壓力源會影響到個體的身心狀態與自我認同，Garnets 等人（1990）亦指出當個體的知覺歧視頻率越高，則越容易對其身心造成破壞性的影響，因此為了瞭解此一壓力源的影響歷程，本研究將以知覺歧視作為測量之變項。而針對知覺歧視的測量方面，國內方面目前尚未發展相關量表，考量到臺灣與國外之同志族群所面臨到的歧視狀況可能有所不同，本研究將採自編量表的方式，藉以了解臺灣同志族群的歧視經驗。

過去研究發現知覺歧視對個體的影響十分廣泛，包括他們較易以社會的偏見或刻板印象檢視自己，並有較差的自我認同狀態（黃軍義、許得洋，2020；Doyle & Molix, 2014a; Sánchez & Vilain, 2012）；較嚴重的憂鬱或焦慮傾向（王建權，2019；Chae & Yoshikawa, 2008; Lehavot & Simoni, 2011）；擔心受他人排擠而增加生理與情緒調適上的負擔（喬虹等人，2022；Gee et al., 2007; Guyll et al., 2001），以及容易透過藥物濫用、菸癮或酒精等方式抒發自身壓力（Clements-Nolle et al., 2006; Pachankis et al., 2014）。由此可見，長期的歧視與不友善的環境，在無形中損害到同志的身心健康與自我認同，其中男性更因社會期待與身份角色的緣故，更易受他人的歧視與霸凌（張德勝等人，2013；Moskowitz et al., 2010; Salvati et al., 2019）；而女性則不僅在性傾向上會受到歧視，在性別上也易受到不平等的對待與騷擾，需同時面對雙重弱勢（double minority）壓力（Trettin et al., 2006）。為了自我保護，個體可能透過認為他人會拒絕自己的心理預期，以避免面對真實被傷害的情境，但也提高了個體有過高的拒絕敏感度與內化恐同的機率（Dyar et al., 2018; Herek et al., 2007）。

（三）知覺歧視與拒絕敏感度對伴侶關係適應之影響

過去研究在探討歧視經驗與拒絕敏感度時，大多著重在了解對個體身心健康的影響，然而本研究根據 Bronfenbrenner（1977, 1979）的生態系統理論、Conger 等人（1994）的家庭壓力模型（family stress model），以及 Clark 等人（1999）的生物心理社會模型（biopsychosocial model）之觀點，認為個體所經歷的遠端與近端壓力源，會影響到他們的人際互動，尤其是伴侶關係，因此以下將說明同志伴侶關係適應的概念，並闡述歧視經驗與拒絕敏感度影響到關係適應之歷程。

1. 伴侶關係適應的概念

張思嘉（1999）在回顧國外關於關係適應的相關文獻後，整理出兩種不同的說法，一部分學者採取靜態的觀點，認為關係適應為伴侶在關係中應達成的目標或狀態；另一部分學者則以動態觀點視之，將關係適應視為一個動態的發展歷程。Spanier 與 Cole（1976）認為採用動態觀點比靜態觀點合宜，使研究者得以針對伴侶的關係變化進行縱貫研究，亦能針對測量當下的關係適應進行探索，因此伴侶的關係適應會受到環境與彼此的互動狀況，在良好與不良的數線上不停變動，此部份與其他學者提及關係會隨著時間與眾多因素不斷變化的觀點一致（Kurdek, 1995）。

相較於異性戀，同志族群對彼此伴侶關係的滿意度較高，但同時也有較多的負面評價與分手機率，彼此的關係也較容易受到外在環境與衝突因應方式等因素所影響（謝文宜等人，2009；Gottman et al., 2003; Kurdek, 1998; Lau, 2012），因此本研究將以動態觀點的關係適應來瞭解同志族群的伴侶關係與互動狀況。

2. 同志族群的拒絕敏感度對關係適應之影響

由於高拒絕敏感度者在面對中性或模糊的情境時，容易將對方的意圖解讀為惡意，進而引發自身的負面情緒與破壞彼此關係，這樣的結果在與伴侶互動時更易看出。在一份縱貫研究中指出若青少年／女有較高的拒絕敏感度，可能會使他們對於被他人拒絕感到過度害怕，因而於日後擔心或焦

慮於受到別人忽視、冷漠等，而較難以投入伴侶關係中，即便在關係中也可能難以擁有安全感，或是較容易退縮或自我沉默等情形存在，導致較差的關係穩定度（Hafen et al., 2014），可見拒絕敏感度會對日後的親密關係產生影響。

Downey 與 Feldman（1996）指出高拒絕敏感度的個體感受到被拒絕之後，容易對關係患得患失，並引發許多負面情緒或因應方式，進而破壞彼此的關係適應狀況。其他研究則發現，高拒絕敏感者在與伴侶發生衝突時，因為害怕被伴侶拋棄或拒絕，而容易有自我沉默、抽離對伴侶的關愛，或是親密暴力的情形，進而衍生更多的爭執，使關係滿意度受損（翁雅萍，2018；Harper et al., 2006；Norona & Welsh, 2016；Volz & Kerig, 2010）。

過去研究發現不同性別的關係適應有所差異，相較於男性，人我關係對女性的自我認同與身心健康有著較密切的關聯，也使他們更重視伴侶關係的互動，並會藉由看重關係中的正向經驗，作為維繫關係的管道（Kurdek, 2003；Sneed et al., 2006；Song et al., 2022）；Cao 等人（2017）則指出相較於男性，女性對於外在壓力更加敏感，因此更易影響到自身的身心健康，且當關係產生負向變化，或是彼此間出現問題時，女性也更容易察覺到，其中若個體的拒絕敏感度較高時，則更容易產生自我沈默或退縮的情形，使彼此的關係更加疏離，導致關係品質更易受到損害（London et al., 2012；Richter & Schoebi, 2021）。此外，不同性別在面對衝突時所採取的因應方式也有所差異，因此對於關係適應的影響程度與機制也有所不同（Downey et al., 2000；Khaddouma et al., 2015；Romero-Canyas et al., 2010）。

在同志族群方面，Mohr 與 Fassinger（2006）發現當個體的污名敏感度越高，則他們的關係適應越差，顯示當個體對於被污名化的預期心理越強烈時，則他們更容易對被拒絕感到焦慮，強化自身的拒絕敏感度，進而在與伴侶互動時產生許多的困擾，包括不願在公共場合展現彼此的關愛，或是不願承認對方為自己的伴侶等，致使關係適應受到影響。Rostosky 等人（2007）在訪談了數十對同志伴侶後，發現許多伴侶皆表示他們在生活中不時會接收到他人的攻擊或拒絕訊息，而有較高的拒絕敏感度，隨後擔心與害怕被他人非議，使他們不願在家中、職場或公共場合談論與公開伴侶關係，進而可能導致彼此誤解對方對關係的看法，並影響到雙方的關係適應。

過去針對同志伴侶的研究中，大多針對性傾向相關的情境進行探討，認為伴侶適應的損害來自於個體對於被旁人攻擊的擔憂，但根據拒絕敏感度的理論基礎，同志族群可能在一般的情境中，亦會過度焦慮與預期他人會拒絕自己的需求，且此互動基模亦可能會顯現在與伴侶的互動關係中，進而損害到彼此的關係適應狀況。亦即個體的高拒絕敏感度會導致他們錯誤解讀對方的行為意圖，並激發自身強烈的情緒反應，為了自我保護而選擇不適切的因應方式，包括過度順從、退縮、控制或暴力威嚇，進而破壞彼此的關係適應。

3. 同志族群的知覺歧視對關係適應之影響

知覺歧視對伴侶關係適應的影響，經由社會文化對同志族群的性污名，透過不同系統間相互運作，影響大眾對該族群的看法，而個體越擔心受到他人歧視時，可能就越不願出櫃，或承認彼此的同性伴侶關係，此可能會進一步影響到伴侶對關係的信任程度，並傷害到彼此的關係適應（Rostosky & Riggle, 2017）。對此，Green 與 Mitchell（2015）指出這些歧視經驗會使個體內化恐同，並可能會將這些挫敗與自我嫌惡的情緒肆意波及到伴侶、因罪惡感而無法順利求愛，以及認為不值得維持或投入彼此的伴侶關係，最終導致關係品質受到損害。

Otis 等人（2006）以 Meyer（2003）的少數壓力模型為基礎，探討同志壓力對他們關係適應的影響後發現，當同志感受到越多的歧視與壓迫，會使他們有更嚴重的內化恐同傾向，進而影響他們的關係適應，較難穩定的維繫彼此的連結。此外，當同志伴侶自覺關係不被祝福且難以維持，容易導致較差的關係承諾與投資程度，也由於這些偏見的緣故，使大多數的同志伴侶需隱身在社會之中，在缺乏一個顯而易見典範的情況下，當伴侶之間有所衝突與困境時，較難以找到可解決之方法和協助的管道，進而容易面臨分手的議題（Frost, 2013；Lehmiller & Agnew, 2006）。更尤其是當同志族群的家人、朋友或同事皆不看好他們、拒絕承認其伴侶關係，甚至意圖破壞他們之間的連結時，這些壓力更易使伴侶對未來感到遲疑，並可能損害到彼此的信任關係，或藉由不當的因應方式來處理彼此的衝突（Kamen et al., 2011；Rostosky et al., 2007）。

此外，長期暴露在歧視環境中，亦會使他們害怕成為被歧視的對象，傾向隱藏自身的性傾向與伴侶關係，維持高度的警覺和自我控制，以避免同志身份曝光，但同時耗費較多的認知資源與注意力，所接收到的回饋可能與付出不成正比，在彼此的關係中容易有負向的互動與態度，並損害自我認同 (Feinstein et al., 2018; Li et al., 2021; Pepping et al., 2019)。由上述可知，當個體的知覺歧視越頻繁，則可能會因為關係投資程度、耗費心力，或是過度緊繃與高警覺性等因素，影響到他們的伴侶關係。

4. 拒絕敏感度的中介效果

透過上述所提及的生態系統理論，可以了解到歧視會透過不同系統間的傳遞，影響到個體的親密關係以及人際互動的方式。另一方面，Conger 等人 (1994) 的家庭壓力模型起初以經濟為外在壓力源，指出當家庭感到經濟困難時，這些負擔會使伴侶感到憂鬱或低落，並影響到雙方的關係，隨後 Barton 等人 (2018) 則以此理論為基礎，表示當少數族群接收到關係以外的威脅與壓力源 (如經濟、工作、歧視或污名等)，會因為壓力的「外溢效應」(spillover effect) (Neff & Karney, 2004)，破壞伴侶關係，亦即其中一方將外在壓力所引起的負面情緒或想法，帶入到關係之中，進而讓這些負面感受波及到另一半，對伴侶關係造成衝擊 (Szymanski et al., 2016)。因此為了自我保護而有較高拒絕敏感度的個體，便容易因為擔心外在的歧視與攻擊，對彼此的關係持有較負面的想法與態度，進而影響到彼此的伴侶關係。

Clark 等人 (1999) 引用生物心理社會模型 (biopsychosocial model) 之觀點，認為當個體於生活中知覺到種族歧視時，會引發他們對於這些壓力的負面生理與心理反應，其中包括憤怒、焦慮、無助與挫折等負面情緒；隨後 Doyle 與 Molix (2014b, 2015) 則根據 Clark 等人之論點以及過往之研究，認為同志族群的知覺歧視，會透過個體的身心健康狀況，影響到彼此的關係適應，亦即個體在知覺到歧視狀況，會因為不曉得如何處理這些負面情緒，而有恣意宣洩或是否認的情況，長期下來則會導致情緒調節能力失衡或是憂鬱等狀況，或是損害到他們的自我形象與自尊，進而導致他們在關係中較難信任伴侶的正向關懷，以及容易因自身的不安全感將對方推開，導致雙方在關係中有更多的衝突與負面情緒 (Doyle & Molix, 2014a)。其中，女性更因在生理反應及伴侶關係變化的敏感度較高，在感受到壓力時更易影響到彼此的身心狀態，並損害到彼此的互動關係與品質 (Cao et al., 2017)。

綜上所述，當同志族群不斷被污名化時，長期處在無形的壓力環境下，可能是他們為了避免再次受到傷害，而在與他人互動時，先抱有被拒絕的預期心理，但同時也導致較高的拒絕敏感度，並損害到他們的自我價值感與情緒調節能力 (Bungert et al., 2015; Göncü & Sümer, 2011; Pachankis et al., 2015)，當高拒絕敏感度的個體處於伴侶關係中時，一方面在面對外在歧視經驗時更易感到壓力、憂鬱與焦慮，隨後因外溢效應，以及自身壓力與情緒調節的能力不佳，影響到伴侶關係；另一方面，高拒絕敏感度的個體也容易在被伴侶拒絕時，啟動自身的自我保護機制，而有許多的負面情緒和行為，損害到彼此的關係。因此本研究將以 Feinstein (2020) 的理論架構為基礎，並整合 Doyle 與 Molix (2014b, 2015) 所提出之論點，假設個體的知覺歧視經驗，會透過他們的拒絕敏感度，對伴侶的關係適應造成影響，亦即拒絕敏感度於知覺歧視、關係適應之間，扮演著中介的角色。

綜合前述論點，本研究欲檢驗的假設為： H_1 ：同志族群的知覺歧視與拒絕敏感度具有顯著正相關； H_2 ：同志族群的知覺歧視與關係適應具有顯著負相關； H_3 ：同志族群的拒絕敏感度與關係適應具有顯著負相關； H_4 ：同志族群的拒絕敏感度，在知覺歧視與關係適應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方法

(一)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以臺灣年滿 20 歲，且目前正處於同性伴侶關係中超過 3 個月的同志族群為研究對象，於 Survey Cake 雲端表單編製問卷，並以立意取樣、滾雪球與網路發放問卷等方式蒐集相關資料，共計回收 316 份，實得有效問卷 293 份。研究對象中，男性共計 117 人 (其中，同性戀 101 人，雙

性戀 16 人)；女性 176 人(其中，同性戀 92 人，雙性戀 84 人)。平均年齡為 28.12 歲 ($SD = 5.53$)，交往月數平均為 42.12 個月(男性平均 42.25 個月，女性平均 42.03 個月)，教育背景 64.84% 為大學、33.79% 為研究所以上，46.08% 為同居狀態(男性為 39.31%，女性為 50.57%)，3.41% 已婚。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自陳式量表作為研究工具，並轉製為網路問卷後進行發放，依序蒐集基本資料、知覺歧視、拒絕敏感度與關係適應。因「知覺歧視量表」為研究者自編，且「拒絕敏感度量表」與「配偶調適量表」在國內尚未運用於同志族群，有鑑於此，本研究將先進行預試並進行項目分析及信效度檢驗，以確立量表之適配性。預試題目的刪題標準如下：(1) 以量表高低兩端之 27% 劃分出高低分組，進行極端組 t 考驗，結果未達顯著；(2) 各個題項與總分之相關 $< .30$ ，刪題後 α 係數上升；(3) 因素負荷量 $< .40$ 或有交叉負荷 (cross-loading) 的狀況。

1. 基本資料問卷

基本資料內容包含參與者姓名、性傾向、年齡、居住地、教育程度、交往月數、同居與否及結婚與否。

2. 知覺歧視量表

本研究認為歧視事件是個體在社會制度、日常生活或人際互動中，因自身性傾向所遭遇到的不平等待遇或暴力事件，而知覺歧視則是個體主觀對外在歧視事件的感知狀況，以及知覺到該經歷的頻率 (Schmitt et al., 2014; Stuber et al., 2008)。本研究以此一構念，並參考國外 Lewis 等人 (2002)、Szymanski (2006)，和 Balsam 等人 (2013) 等量表、國內友善台灣聯盟 (2012) 之問卷調查結果，以及陳彤昀 (2014) 之研究內容撰寫題項，隨後經三位專家學者進行專家內容效度審查，編製符合華人文化的「知覺歧視量表」。

原始量表之編製為單一構念，共計 14 題，然於預試因素分析中，共萃取出三個因素，根據題項內容分別命名為「隱性歧視」(例：受到他人的異樣眼光注視)、「原生家庭之歧視」(例：被家人斷絕關係或逐出家門)，以及「言語與肢體方面之歧視」，因前兩個因素僅有兩個觀察變項，因此經考量後將題項刪除。

本研究之正式量表共計 10 題，以李克特氏六點量表計分，1 代表「從未發生」，6 則代表「總是發生」，參與者的分數越高，表示他們受到的歧視經驗頻率越高。在信度分析方面，全量表 Cronbach's α 為 .89；而因素分析方面可萃取出 2 個因素，依題項內容重新命名為「言語與心理方面的歧視」(例：被他人取笑或嘲弄)以及「肢體方面的歧視」(例：受到他人肢體羞辱或攻擊)，共可解釋總量表 63.26% 的變異量，結果顯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指標。本量表主要測量同志族群在生活中因自身性傾向所遭遇的所有歧視事件，以了解該族群普遍的知覺歧視經驗，因此本研究將以整體量表分數進行分析。

3. 拒絕敏感度量表

本研究採用陳思帆 (2008) 翻譯 Downey 與 Feldman (1996) 所發展之拒絕敏感度量表 (Rejection Sensitivity Questionnaire, RSQ)，用以測量同志族群在面對被拒絕訊息時，所產生的預期與焦慮程度。每題皆會描述一個情境，並邀請受試者針對自身情況，填寫「在提出要求時，感到擔憂的程度 (焦慮程度)」以及「預期對方接受要求的可能性 (期望程度)」兩個分數。量表皆以 Likert 的六點量表計分，1 代表「非常不擔心」或「非常不可能同意」，6 則代表「非常擔心」或「非常可能同意」。

在計分方式，Downey 與 Feldman (1996) 以期望價值理論為模型，藉由計算個體在面對各個情境時的焦慮程度與負向期望程度，將兩分數相乘後作為各個題項之拒絕敏感度指標。其計分方式如下：(1) 計算各題之焦慮程度與負向期望程度 (7-期望程度)；(2) 將「焦慮程度」與「負

向期望程度」相乘；(3) 將相乘過後之分數加總後，除以總題數，即為拒絕敏感度分數。

原量表共計 18 題，本研究依上述之刪題標準，於預試時共刪除 6 題（例：我要求我的父母幫忙我決定該選填哪些志願），正式施測時則刪除 3 題（例：我要求父母給我額外的錢來支付生活費），經保留之題項與人際互動有較高的關聯（例：在激烈爭執後，我打給我的男／女朋友並告訴他我想跟他見面），保留的題項內容與本研究預測量之拒絕敏感度的構念仍相符合。刪題後之全量表總題數共 9 題，「焦慮程度」與「期望程度」之 Cronbach's α 為 .82 與 .74；效度方面，其可解釋變異量則分別為 42.21% 與 35.50%，顯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指標。

4. 配偶調適量表

本研究以 Spanier (1976) 所發展之「配偶調適量表」(Dyadic Adjustment Scale, DAS) 作為研究工具，用以測量同志族群伴侶的關係適應。原始量表共計 32 題，包含了四個分量表，分別為滿意度 (dyadic satisfaction)、一致性 (dyadic consensus)、情感表達 (affectional expression) 與凝聚力 (dyadic cohesion)。伊慶春 (1991) 已翻譯此量表，並針對國內夫妻進行修訂，然本研究之參與者為同志伴侶，考量到兩族群之差異，因而使用尚未修訂之原中文翻譯量表進行預試與修改，藉以瞭解同志族群對於伴侶關係適應的主觀感受與滿意程度。

原量表共計 32 題，本研究根據上述之刪題標準，共刪除 15 題（如：對家庭金錢處理的意見一致、爭吵後不常負氣離家），刪題後之全量表共計 17 題，其中包括滿意度 8 題（如：信任伴侶、很少後悔同居或結婚）、一致性 5 題（如：所看重的事情和目標一致、對事業的決定想法一致）、凝聚力 4 題（如：常一起計畫事情或一起做事、常有觀念上的溝通）。本研究萃取之因素與伊慶春 (1991) 以臺灣異性戀為參與者所得到的結果一致，亦即兩份量表的因素內涵是一致的，僅各個因素之題數有所減少，顯示不同性傾向對於關係適應所關注的層面是相似的。

計分方式採李克特氏六點量表，1 代表「非常不符合／幸福／願意」，6 則代表「非常符合／幸福／願意」，其中 2 題為反向題，參與者的分數越高，則表示他們的伴侶關係適應狀況越好。在信效度分析方面，全量表、「滿意度」、「一致性」與「凝聚力」之 Cronbach's α 分別為 .90、.86、.84、.75，而全量表的可解釋變異量為 58.02%，顯示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指標。

(三) 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統計軟體 SPSS 25 及其外掛程式 PROCESS 進行資料分析，透過描述性統計、卡方檢定、獨立樣本 t 檢定與皮爾森積差相關，了解樣本特性以及各個研究變項之間的關聯性與差異情形。中介效果檢驗的部份，研究者以 Efron (1967) 所提出的無母數統計推論法，將現有之樣本當做母群進行多次反覆取樣的方式，重新建立大量樣本，使現有樣本數得以擴增，並建立起中介效果的信賴區間 (confidence interval, CI)，若 $(1-\alpha) 100\%$ 的信賴區間中不包含 0，則該中介效果在 α 顯著水準下達到顯著，藉以檢驗拒絕敏感度在知覺歧視、關係適應之間，是否具有中介作用。

結果

(一) 知覺歧視、拒絕敏感度與關係適應的概況

同志族群在知覺歧視量表的題平均數為 1.62，低於中間值，顯示參與者整體而言在生活中，遭受到他人歧視的頻率介於「很少發生」至「偶爾發生」之間。

在拒絕敏感度方面，全量表的題平均為 7.58，而焦慮程度分量表與期望程度分量表的題平均則為 2.65、2.58，顯示參與者的拒絕敏感度普遍偏低，在向他人提出需求的時候，也比較不容易感到焦慮，亦認為他人較傾向答應自身的請求。

關係適應全量表的題平均為 4.70，而滿意度、一致性與凝聚力分量表的題平均數則為 4.95、4.20、4.81，皆高於中間值，顯示參與者多數在目前的伴侶關係適應狀況良好，且彼此的想法較為一致，也有較佳的互動狀況。

(二) 不同性別在各個變項上之差異比較分析

背景變項方面，卡方檢定的結果顯示，同居與否在不同性別上未達顯著 ($\chi^2 = 3.58, p = .058$)；而獨立樣本 t 檢定的結果顯示，交往時間在不同性別上亦未達顯著 ($t = 0.04, p = .965$)，亦即是否同居與交往時間長短，並未因性別而有所差異。

主要變項方面，不同性別在拒絕敏感度整體分數 ($t = 1.76, p = .083$) 與焦慮程度分量表 ($t = 0.49, p = .630$) 上未達顯著，其餘變項上皆存在顯著差異。知覺歧視方面，結果發現男性 ($M = 18.66$) 在生活中所遭遇到的歧視經驗較女性 ($M = 14.53$) 來得頻繁。在拒絕敏感度方面則顯示男性 ($M = 24.33$) 相對於女性 ($M = 22.54$) 而言，較容易預期別人會拒絕自己的需求。在關係適應的部份，結果顯示不論是整體的關係適應，抑或是個別的分向度方面，女性相對於男性而言，皆較為滿意自己現在的伴侶關係狀態，且有較和諧的互動模式與較一致的觀念和想法。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性別在各個變項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摘要表

變項	男性 ($N = 117$)		女性 ($N = 176$)		t 值
	M	SD	M	SD	
知覺歧視	18.75	6.27	14.42	4.94	6.29***
拒絕敏感度	8.04	3.74	7.28	3.42	1.76
焦慮程度	24.15	8.06	23.69	7.53	0.49
期望程度	24.20	5.41	22.58	5.01	2.62**
關係適應	77.13	11.11	81.62	10.98	-3.41***
滿意度	38.41	6.05	40.34	5.76	-2.75**
一致性	20.21	3.83	21.55	4.26	-2.75**
凝聚力	18.51	3.25	19.74	3.01	-3.31***

** $p < .01$. *** $p < .001$.

(三) 知覺歧視、拒絕敏感度、關係適應之相關分析

相關係數表列於表 2 及表 3，結果指出不論性別，知覺歧視與整體拒絕敏感度、焦慮程度及期望程度皆呈現顯著正相關，亦即當個體的知覺歧視越高時，則他們的整體拒絕敏感度以及個別的分量表方面皆會越高。

女性方面，其整體拒絕敏感度與關係適應之間，以及知覺歧視與整體關係適應之間皆為顯著負相關，亦即當個體的知覺歧視或整體拒絕敏感度越高，則整體關係適應越差。男性方面，則僅發現整體拒絕敏感度與關係適應的一致性分量表呈現顯著負相關，其知覺歧視與整體關係適應，以及拒絕敏感度與整體關係適應之間皆未達顯著相關。

(四) 拒絕敏感度在知覺歧視與伴侶關係適應之中介效果驗證

研究者以 Efron (1967) 所提出之拔靴法 (bootstrap) 進行統計考驗，相對於 Baron 與 Kenny (1986) 認為自變項必須能夠顯著預測依變項，才需進一步進行中介效果之驗證，此方法則認為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關係可能受到許多干擾變項所影響，因此即便其預測力不顯著，並不代表兩者之間並不存在中介變項 (Preacher & Hayes, 2004)，因此仍可進行統計考驗。

表 2
全樣本各個變項之相關係數摘要表

	知覺歧視	拒絕敏感度	焦慮程度	期望程度	關係適應	滿意度	一致性	凝聚力
知覺歧視	—							
拒絕敏感度	.35***	—						
焦慮程度	.27***	.89***	—					
期望程度	.35***	.80***	.51***	—				
關係適應	-.20***	-.30***	-.19***	-.38***	—			
滿意度	-.15**	-.23***	-.14**	-.33***	.91***	—		
一致性	-.24***	-.31***	-.21***	-.34***	.79***	.54***	—	
凝聚力	-.11	-.22***	-.14**	-.28***	.81***	.65***	.49***	—

** $p < .01$. *** $p < .001$.

表 3
男性和女性在各個變項之相關係數摘要表

	知覺歧視	拒絕敏感度	焦慮程度	期望程度	關係適應	滿意度	一致性	凝聚力
知覺歧視	—	.39***	.33***	.33***	-.19*	-.09	-.30***	-.10
拒絕敏感度	.27**	—	.88***	.79***	-.37***	-.28***	-.35***	-.34***
焦慮程度	.22*	.91***	—	.47***	-.26***	-.15*	-.28***	-.28***
期望程度	.31***	.82***	.58***	—	-.43***	-.40***	-.33***	-.34***
關係適應	-.08	-.17	-.08	-.26**	—	.90***	.80***	.79***
滿意度	-.11	-.15	-.11	-.19*	.91***	—	.53***	.63***
一致性	-.08	-.22*	-.10	-.32***	.77***	.52***	—	.48***
凝聚力	.02	-.04	.04	-.17	.81***	.65***	.48***	—

註：右上三角數值樣本為女性 ($N = 176$)；左下三角數值樣本為男性 ($N = 117$)。

* $p < .05$. ** $p < .01$. *** $p < .001$.

1. 全部參與者的拒絕敏感度在知覺歧視與伴侶關係適應之中介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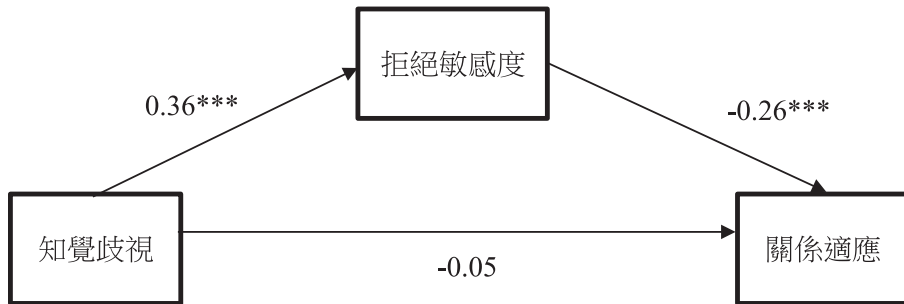
如表 4 所示，在間接效果的部份，其 95% 信賴區間上下界為 -0.16、-0.04，未包含 0，表示中介效果存在，隨後檢視直接效果的部份，其 95% 信賴區間上下界為 -0.17、0.08，其間包含 0，直接效果並不成立，顯示此為完全中介模型，亦即拒絕敏感度在知覺歧視與伴侶關係適應之間具有完全中介之效果，圖 1 呈現此中介效果之路徑圖。

表 4
中介效果分析摘要表

	β	SE	t	LLCI	ULCI
知覺歧視→拒絕敏感度	.36	.06	6.00***	.24	.47
拒絕敏感度→關係適應	-.26	.06	-4.44***	-.38	-.15
間接效果	-.09	.03	—	-.16	-.04
直接效果	-.05	.06	-0.78	-.17	.08
總效果	-.14	.06	-2.32*	-.26	-.02

* $p < .05$. *** $p < .001$.

圖 1
中介效果之路徑圖



2. 不同性別的拒絕敏感度在知覺歧視與伴侶關係適應之中介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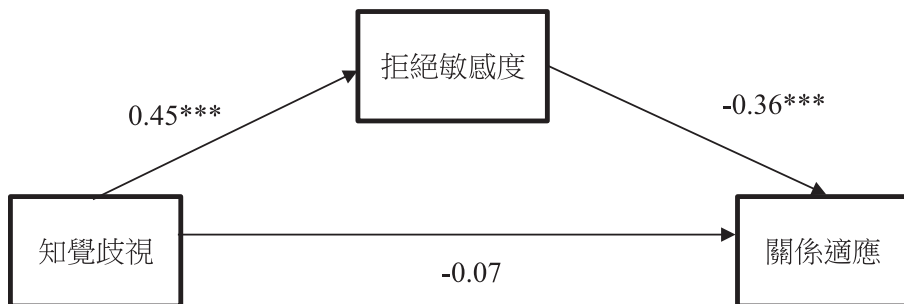
由於不同性別在各個變項上存在顯著差異，因此研究者以性別作為分組，分別進行男、女性的中介效果檢驗。女性方面（如表 5 所示），在間接效果的部份，其 95% 信賴區間上下界為 -0.26、-0.08，未包含 0，表示中介效果存在，隨後檢視直接效果的部份，其 95% 信賴區間上下界為 -0.25、0.11，其間包含 0，直接效果並不成立，顯示此為完全中介模型，亦即女性同志族群的拒絕敏感度在知覺歧視與伴侶關係適應之間具有完全中介之效果，圖 2 呈現此中介效果之路徑圖。

表 5
女性之中介效果分析摘要表

	β	SE	t	LLCI	ULCI
知覺歧視→拒絕敏感度	.45	.08	5.66***	.30	.61
拒絕敏感度→關係適應	-.36	.08	-4.53***	-.51	-.20
間接效果	-.16	.05	-	-.26	-.08
直接效果	-.07	.09	-0.75	-.25	.11
總效果	-.23	.09	-2.62*	-.40	-.06

* $p < .05$. *** $p < .001$.

圖 2
女性之中介效果路徑圖



男性方面，由於拒絕敏感度在知覺歧視與整體關係適應間，並不具中介效果，然在分量表部分可發現，拒絕敏感度則與一致性有顯著相關，因此研究者檢視其在知覺歧視與一致性之間是否存在中介效果。結果如表 6 所示，以知覺歧視預測拒絕敏感度的結果顯示其 95% 信賴區間上下界為 0.08、0.44，並未包含 0 且 β 為正，表示知覺歧視對拒絕敏感度具有正向的預測力。中介效果方面，間接效果 95% 信賴區間上下界為 -0.12、-0.00，而直接效果的信賴區間 (-0.18, 0.15) 則包含 0，顯示其

為完全中介模型，因此拒絕敏感度在知覺歧視與關係適應一致性之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

表 6
男性的拒絕敏感度在知覺歧視與一致性分量表之中介效果摘要表

	β	<i>SE</i>	<i>t</i>	<i>LLCI</i>	<i>ULCI</i>
知覺歧視→拒絕敏感度	.26	.09	2.92**	.08	.44
拒絕敏感度→一致性	-.18	.09	-2.15*	-.35	-.01
間接效果	-.05	.03	–	-.12	-.00
直接效果	-.01	.09	-0.15	-.18	.15
總效果	-.06	-.08	-0.74	-.23	.10

* $p < .05$. ** $p < .01$.

討論與建議

(一) 男性同志族群相對於女性而言有較多的知覺歧視，女性相對於男性則有較佳的關係適應

結果顯示男性同志族群相對於女性而言，在生活中所感知到的歧視經驗較頻繁，過去研究亦指出男性相較女性，更容易因性傾向而受到他人的歧視與霸凌，以及父母的責難 (Balsam et al., 2005; D'Augelli et al., 2006; Salvati et al., 2019)。針對此部份，推測可能是社會對男性性別氣質的要求更為嚴格與不可違背，且對於男異性戀者而言，男同志更容易引發他們的反感與負面情緒，或是較不被旁人所接受與認同，致使男性相對而言更容易受到他人的歧視 (張德勝等人, 2013; Moskowitz et al., 2010)。

拒絕敏感度方面，不同性別在整體分數上並無差異，但男性的負向期望程度比女性來得高，此與過去研究部分相符。London 等人 (2007) 指出相較於女性，男性對外在的拒絕訊息較為敏感，而 Marston 等人 (2010) 則發現被同儕拒絕僅會增強男性的拒絕敏感度，因此研究者推斷同志族群在成長的過程中，由於男性較易接收到他人的負面訊息，且相較於女性有更多的歧視或受壓迫的經驗，因此在兩者的交互作用下，可能使這些負面經歷更強烈的影響男性與他人的互動模式，進而導致他們更易預期他人會拒絕自己。

關係適應的部份，結果顯示女性比男性有更好的關係適應狀況。Kurdek (2008) 在以不同性傾向與性別的伴侶為參與者，並用縱貫研究的方式探討他們在同居期間的關係適應變化，指出女同志比男同志的關係適應狀況好，此部份可能為不同性別在伴侶關係中所有的互動模式差異所導致。Gottman 等人 (2003) 指出女同志在面對伴侶間的衝突時，較能夠以幽默的方式看待，也會在關係中展現較多的興趣與熱忱，以及更多的情感表達；相對的，男同志在面對關係衝突時，若一方的情緒過於激烈且負面，則往往會使彼此在修復伴侶關係時更加困難。Khaddouma 等人 (2015) 指出男同志在伴侶關係中，相較於女性而言，會需要較多的時間修復彼此的關係，且在面對衝突的時候，較易退縮或逃避尋找解決方式，因此可能使他們比女性而言有較不佳的關係適應狀況。

(二) 知覺歧視、拒絕敏感度與關係適應之相關討論

1. 不論性別，知覺歧視經驗越多，則有較高的拒絕敏感度

過往針對同志族群的拒絕敏感度之研究，大多採用 Pachankis 等人 (2008) 所編製的同志相關拒絕敏感度量表，而本研究則以一般的拒絕敏感度量表為測量工具，結果發現當個體的知覺歧視越高時，則他們在一般的人際互動情境中，亦會有較強烈的拒絕敏感度，與過往的研究結果一致 (Dyar et al., 2018; Feinstein et al., 2012; Feinstein et al., 2014)。此部分與 Meyer (2003)、Feinstein (2020) 與 Romero-Canyas 等人 (2010) 的理論相符，意即同志族群在生活中因性傾向經驗到別人更多的歧視或不平等對待時，會使他們啟動自我保護的機制，以避免再度受到傷害，並保持較高的警覺和敏感度，此部分可幫助他們杜絕危險的處境，然而這些經驗也可能在互動過程中，逐漸被整合進自身

的內在運作模式，使他們不僅在自身性傾向被揭露，或是被異樣看待的可能場合下有此擔心，而是跨情境下皆會害怕被拒絕與過度警覺，意即在與人互動的一般情境中，亦會使他們在提出自身需求時，較易感到焦慮且傾向預期他人會拒絕自己的要求。由此可知，社會文化對該族群的歧視和污名，會嚴重的影響他們與人互動的方式和感受，並可能損害到自身的身心健康，因此社會大眾需增進對該族群的了解，並調整自身態度，減少對他們的壓迫，進而讓同志族群在更友善的環境下成長。

2. 女性同志族群的知覺歧視經驗越少，關係適應越佳，男性則無此一關聯

本研究結果顯示，女性的知覺歧視程度能夠負向預測其關係適應狀況，然而男性則不存在此一關聯性與預測力。過去部分研究指出當個體所感知到的歧視狀況越嚴重時，可能會使他們吸收這些負面想法和態度，產生較多的負面情緒，並在伴侶關係中容易因不安全感而與對方發生衝突 (Doyle & Molix, 2014b, 2015)。其他研究則提及男性的歧視經驗與關係適應間並無關聯，然而女性因性傾向而遭遇之壓力事件，則會負向預測其伴侶關係狀況 (Cao et al., 2017; Todosijevic et al., 2005)。

Cao 等人 (2017) 的後設研究中指出相較於男同志，女同志在生理上對於壓力會較為敏感，且對於伴侶關係的變化或問題 (如：權力不平等) 較為敏銳，因此當社會歧視對女同志造成壓力時，更容易影響到他們的情緒與身心狀態，進而在與伴侶互動上可能有負面的變化。Song 等人 (2022) 亦指出女性因比男性更注重人際關係的特質，使他們更在意與伴侶的互動狀況，當對方產生變化 (如：冷漠、衝突) 時，更易受到衝擊，並在關係中產生更多紛爭，損害到關係品質。

此外，Kamen 等人 (2011) 在以男同志為參與者的研究中，發現在不同信任程度下，個體的歧視經驗對關係適應的影響力便有所差異；Daoultzis 與 Kordoutis (2023) 納入愛情三元論的概念，指出男同志伴侶的友伴式愛情模式 (companionate love) 相較於其他愛情模式，有助於伴侶的情感溝通與協商，進而緩衝內化恐同對關係適應的損害；Song 等人 (2022) 則提及個體的歧視經驗，會因為伴侶對關係態度的變化 (如：減少親密行為)，衍生出更多的關係衝突，進而損害到關係適應。因此，研究者推測此性別差異之可能原因為歧視經驗受到其他干擾變項 (如：伴侶之信任程度、關係模式、對關係態度的變化) 所影響，導致在不同程度的干擾變項下，不同性別的知覺歧視經驗與關係適應間的關聯性有所不同。

綜上所述，此部分的差異可能導因於不同性別面對壓力或問題的敏感程度不同，或是受到其他因素與變項的影響。對此，仍須未來的其他研究進行探索，以了解知覺歧視對關係適應影響的性別差異。

3. 女性同志族群的拒絕敏感度越低，關係適應越佳，男性則無此一關聯

本研究發現僅有女性的拒絕敏感度越高，則有越差的關係適應情形，但男性則不存在此一關聯。過去部分研究指出當個體的拒絕敏感度越高時，則他們更容易錯誤詮釋對方的行為，以及更易感受到自己被對方所拒絕而引發爭執，或是害怕被冷落而選擇壓抑，進而導致彼此對關係有更強烈的不安全感與更差的關係適應情形 (Harper et al., 2006; Volz & Kerig, 2010)。然而部分研究則提及僅有女性的拒絕敏感度能夠預測其伴侶關係，亦即高拒絕敏感度的女性在感受到自己被冷落時，他們更容易與對方發生爭執，並對關係適應感到更不滿意，同時增加情緒抽離的可能性 (Downey et al., 1998; Romero-Canyas et al., 2010)。

對此，Richter 與 Schoebi (2021) 指出高拒絕敏感度的女性更易預期伴侶會拒絕自己的需求，然而男性則無此一情形，而後為了避免再次經歷這些威脅訊號，女性容易有自我沈默或退縮的行為，使他們難以看見正向的互動經驗，也不易維持良好的關係，進而損害到彼此的關係適應 (Kurdek, 2003; London et al., 2012)。此外，不同性別在面對衝突情境時，所採取的因應方式會有所差異，Ayduk 等人 (2008) (引自 Romero-Canyas et al., 2010) 指出相對於女性，男性較能夠將爭執視為關係投入的契機，因此他們傾向於尋找方法來處理彼此的衝突與議題，或是透過一些小技巧緩和氣氛，此外，男性相對而言也更願意與對方討論因應的管道，較不會獨自反芻或思考解決辦法。綜上所述，在面對同樣的衝突情境時，女性較容易在感受到被拒絕後，不斷的反芻並增加情緒抽離的可能性，然而男性則較傾向解決彼此的衝突，也因此不同性別在拒絕敏感度對關係適應的預測能力上有所差異。

(三) 女性同志族群的拒絕敏感度於知覺歧視與關係適應間具有中介效果，男性則無

研究結果顯示，女性的拒絕敏感度在知覺歧視與關係適應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對此過去研究指出個體的知覺歧視經驗越嚴重時，則會有較高的拒絕敏感度 (Feinstein et al., 2014; Pascoe & Smart Richman, 2009)，同時高拒絕敏感度容易使個體在與伴侶互動時有錯誤的評估，進而損害到關係適應 (Volz & Kerig, 2010)。由此可知，就女性同志族群而言，生活中所遭遇到的歧視經驗，影響了他們與人的互動模式，以及在面對這些經驗時所採取的因應措施，致使他們較容易預期別人會因自身性傾向而拒絕自己，並對他人反應或環境有較高的警覺 (Hatzenbuehler, 2009)，長期下來可能導致較高的拒絕敏感度，並藉由外溢效應，或是情緒調節能力的失衡等原因，使他們易因自身的不安而在關係中有更多的衝突或負面情緒，進而損害到關係適應 (Doyle & Molix, 2014a)。

此部分的性別差異，可能導因於以下幾點，其一為相較於男同志，女同志族群需面對異性戀霸權與父權主義的雙重弱勢的壓力 (Trettin et al., 2006)，意即不僅需面對性傾向的污名，在性別上也時常受到不平等的對待與騷擾，使他們更容易覺得自己是不夠好的人，因而在生活中認為自己的想法、感受不重要與不會被重視，導致有較多的自我沈默行為，更尤其是高拒絕敏感度的個體，在被拒絕或發生衝突時，會更易出現隱忍、犧牲或不願表達的情形，進而使彼此更難以溝通與互動，也損害到關係品質 (Szymanski et al., 2016)。

此外，黃曦等人 (2018) 探討女同志伴侶的關係特質時，提及非同居的 T 會有較高的內化恐同，也對於伴侶的身份認同感到強烈的不確定性，認為對方是可以選擇喜歡男性的，因此更須面對與男性競爭的壓力，也會對感情狀態患得患失與充滿猜疑，而其伴侶則會為了安撫他們的不安定情緒耗費大量的心力，導致彼此的關係品質受到損害。

由上述可知，雖然女同志知覺到的歧視經驗可能較男性少，但他們同時需面對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及歧視，而 Szymanski 等人 (2016) 亦提及女性本身在性別上的弱勢，也會損害到女同志的身心健康與伴侶關係，縱使本研究並未探討他們因性別受到的歧視經驗，但一如異性戀霸權對同志族群的影響，父權主義對女同志的損害亦需受到重視。

(四) 實務建議

透過此次研究之結果，可以得知社會文化對同志族群的影響深遠，且在跨情境的狀況下皆會影響到個體與旁人的互動方式，更尤其以女性而言，他們更須面臨來自同志身份與女性身份的外在歧視和騷擾，這些壓迫更可能滲入到他們的私生活中，損害到他們與伴侶的關係狀態，因此即便案主能夠坦承自己的同志身份、過去受歧視之經驗，以及對外在環境壓迫的擔憂，仍可能會對他們的生活各方面造成影響。

有鑑於此，實務工作者在與同志族群工作時，將拒絕敏感度納入工作地圖中，更有助於了解該族群對於外在刺激過度警覺的緣由，並對於他們所受的歧視經驗更加敏覺，然而拒絕敏感度雖損害到他們的身心健康與伴侶關係，也需提醒自已此機制的自我保護作用，並協助個案看見外在環境對他們的壓迫，以避免他們將這些負面經驗與互動模式咎責於自己，同時能夠調整以因應外界的壓力。

在現今多元的社會文化下，同志族群亦會受到其他的因素所影響，包括本研究中所提及的性別，或是過去研究中的種族、社經地位等，因此助人者在與同志族群工作時，也需注意他們的其他身份特性，以避免自己以一概全，並對個案有更全面的理解，以提供更適切的幫助。

最後，由本研究與過去研究皆可發現，環境對同志族群的污名化，是導致他們身心受損非常主要的原因之一，因此以三級預防的概念著手，在社會與教育層面可辦理相關講座或活動，以提升大眾對該族群的認識，協助了解歧視對他們的影響和傷害，並達到去污名的目的，進而共創多元包容的環境，讓同志族群能在更友善的社會中生活。

(五) 研究限制與建議

知覺歧視量表為研究者參考國外量表與國內外相關文獻、調查編製而成，然而在進行預試之因素分析時，發現預試量表可萃取出三個因素，除了正式量表中保留下之因素外，另兩個因素分別為

「隱性歧視」與「原生家庭之歧視」兩者，雖因為其因素皆只有兩個觀察變項，因而於正式施測中予以刪題，但由此可以推測臺灣同志族群在生活中，除了日常時有所聞之言語、精神與肢體歧視經驗外，亦可能在家庭中受到父母的責難與冷落，或是在生活中遭受到他人的異樣眼光看待，這些都可能為該族群所碰到的歧視經驗，然而對此部份之本土研究仍有所匱乏。因此，研究者建議日後學者可以針對臺灣本土同志族群的經驗與概況，建立與編製合適之測量工具。

在抽樣方式方面，本研究採立意取樣，並以廣發網路問卷以及透過滾雪球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因此所觸及之參與者可能較集中為有上網習慣且願意參與同志研究、較高教育程度的族群，在生活中較有機會接觸到良好的教育資源，以及相對較多的性平資訊和觀念，因此可能致使他們在知覺歧視經驗的頻率較低。此外，由於本主題之設定，對於拒絕接受自身性傾向的同志族群，可能因為擔心受歧視而隱身其中，導致較難以觸及與探究他們的生活經驗，因此建議日後研究可拓展資料蒐集之管道，藉以更全面了解該族群的生命經歷。

在關係適應方面，此次研究僅從伴侶中的其中一人進行資料蒐集與探討，然而在伴侶關係中，個體的生活經驗或互動狀態也會影響到另一人對於關係的評價，且過去研究亦顯示同志族群的內化恐同程度，會影響到伴侶對關係的態度與想法。因此研究者建議日後學者在進行資料蒐集時，可以請同志伴侶一起填寫並作註記，進而可以透過對偶分析的方式，了解伴侶一方的生命經驗，對另一方的影響為何。

雖國外針對拒絕敏感度對伴侶關係的影響之相關研究結果並不一致，針對同志族群的探究亦較少，但藉由本研究初探臺灣同志族群的知覺歧視、拒絕敏感度與關係適應之概況，可發現歧視經驗對該族群在人際與伴侶互動上會造成損害，且不同性別的影響層面與歷程可能有所差異，因此建議未來學者可探究知覺歧視對男同志伴侶關係的影響途徑，以及歧視經驗在其他層面對同志族群的傷害。

參考文獻

- 王建權（2019）：《恐同對待對同性戀和雙性戀男性之精神健康影響》（未出版博士論文），高雄醫學大學。[Wang, C.-C. (2019). *Effects of homophobic maltreatment on mental health in gay and bisexual me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 友善台灣聯盟（2012）：〈「台灣同志壓力處境問卷」調查結果初步分析〉。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https://hotline.org.tw/news/190> [Youshan Taiwan Lianmeng. (2012). "Taiwan tongzhi yali chujing wenjuan" diaocha jieguo chubu fenxi. Taiwan Tongzhi (LGBTQ+) Hotline Association. <https://hotline.org.tw/news/190>]
- 伊慶春（1991）：〈臺北地區婚姻調適的一些初步研究發現〉。《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 C：人文及社會科學》，1，151-173。[Yi, C.-C. (1991). Some findings on marital adjustment of Taipei residen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public of China, Part 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 151-173.]
- 翁雅萍（2018）：《大學生多元自尊、拒絕敏感度與愛情關係適應之相關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臺北市立大學。[Wong, Y.-P. (201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dimensional self-esteem,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love relationship adjustment in college student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Taipei.]
- 陳彤均（2014）：《同性戀壓力源、壓力因應策略與心理健康狀態之調查研究—以身分認同程度高低者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Chen, T.-Y. (2014). *The research of lesbian and gay male stressor, stress coping strategy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survey—case in the high and*

- low degree of homosexual identity*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 陳思帆 (2008) : 《大學生依附關係、拒絕敏感度與曖昧訊息處理之關係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Chen, S.-F. (2008).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ambiguou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college student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張思嘉 (1999) : 〈從系統觀點看婚姻適應的研究〉。《應用心理研究》, 2, 111–123。[Chang, S.-C. (1999). A systems framework for marital adjustment study. *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2, 111–123.]
- 張德勝、游家盛、王采薇 (2013) : 〈大學生對男同志和女同志人際關係態度之調查研究〉。《教育心理學報》, 44, 411–432。[Chang, T.-S., You, C.-S., & Wang, T.-W. (2013). University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 gay and lesbian peer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4, 411–432.] <https://doi.org/10.6251/BEP.20110524>
- 喬虹、廖述揚、邱苡家、林勻婷、陳詩穎 (2022) : 〈親愛的同學, 我其實是……: 同志教師出櫃抉擇及其教學經驗之探討〉。《教育心理學報》, 53, 617–642。[Chiao, H., Liao, S.-Y., Chiu, Y.-C., Lin, Y.-T., & Chen, S.-Y. (2022). Dear students, in fact, I am ...: LGBQ teachers' decisions of whether to come out at work and their teaching experience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3, 617–642.] [https://doi.org/10.6251/BEP.202203_53\(3\).0005](https://doi.org/10.6251/BEP.202203_53(3).0005)
- 黃軍義、許得洋 (2020) : 〈遭遇性侵害經驗、強暴迷思、與性別偏見對男同志做出性侵害行為的影響〉。《教育心理學報》, 52, 337–364。[Huang, J.-Y., & Hsu, T.-Y. (2020). Effects of experiences of sexual assault, rape myths, and gender biases on sexual assault perpetrated by homosexual men in Taiwan.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2, 337–364.] [https://doi.org/10.6251/BEP.202012_52\(2\).0005](https://doi.org/10.6251/BEP.202012_52(2).0005)
- 黃曦、謝文宜、曾秀雲 (2018) : 〈女同志伴侶情境因素對承諾維持的影響: 比較 T / 非 T 與同居狀態的差異〉。《台灣性學學刊》, 24 (1), 1–25。[Huang, X., Shieh, W.-Y., & Tseng, H.-Y. (2018). The impact of social contextual factors on commitment of female same-sex couples: Comparing T/not T with different living arrangement. *Formosan Journal of Sexology*, 24(1), 1–25.] <https://doi.org/10.3966/160857872018052401001>
- 謝文宜、蕭英玲、曾秀雲 (2009) : 〈台灣同志伴侶與夫妻關係品質之比較研究〉。《輔導與諮商學報》, 31 (2), 1–21。[Shieh, W.-Y., Hsiao, Y.-L., & Tseng, H.-Y. (2009).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of same-sex couples and married couples in Taiwan. *The Journal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31(2), 1–21.] <https://doi.org/10.7040/JGC.200911.0001>
- Balsam, K. F., Beadnell, B., & Molina, Y. (2013). The Daily Heterosexist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 Measuring minority stress among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adults.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46(1), 3–25. <https://doi.org/10.1177/0748175612449743>
- Balsam, K. F., & Mohr, J. J. (2007). Adaptation to sexual orientation stigma: A comparison of bisexual and lesbian/gay adult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4(3), 306–319. <https://doi.org/10.1037/0022-0167.54.3.306>

- Balsam, K. F., Rothblum, E. D., & Beauchaine, T. P. (2005). Victimization over the life span: A comparison of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heterosexual sibling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3*(3), 477–487. <https://doi.org/10.1037/0022-006X.73.3.477>
- Baron, R. M., &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6), 1173–1182. <http://doi.org/10.1037/0022-3514.51.6.1173>
- Barton, A. W., Beach, S. R. H., Bryant, C. M., Lavner, J. A., & Brody, G. H. (2018). Stress spillover, African Americans' couple and health outcomes, and the stress-buffering effect of family-centered prevention.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32*(2), 186–196. <https://doi.org/10.1037/fam0000376>
- Bronfenbrenner, U. (1977). Toward an experimental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32*(7), 513–531.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32.7.513>
- Bronfenbrenner, U. (1979).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ungert, M., Liebke, L., Thome, J., Haeussler, K., Bohus, M., & Lis, S. (2015).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symptom severity in patients with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Effects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self-esteem.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and Emotion Dysregulation, 2*, Article 4. <https://doi.org/10.1186/s40479-015-0025-x>
- Cao, H., Zhou, N., Fine, M., Liang, Y., Li, J., & Mills-Koonce, W. R. (2017). Sexual minority stress and same-sex relationship well-being: A meta-analysis of research prior to the U.S. nationwide legaliz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9*(5), 1258–1277. <https://doi.org/10.1111/jomf.12415>
- Chae, D. H., & Yoshikawa, H. (2008). Perceived group devaluation, depression, and HIV-risk behavior among Asian gay men. *Health Psychology, 27*(2), 140–148. <https://doi.org/10.1037/0278-6133.27.2.140>
- Clark, R., Anderson, N. B., Clark, V. R., & Williams, D. R. (1999). Racism as a stressor for African Americans: A biopsychosocial model.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10), 805–816.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4.10.805>
- Clements-Nolle, K., Marx, R., & Katz, M. (2006). Attempted suicide among transgender persons: The influence of gender-based discrimination and victimization.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51*(3), 53–69. https://doi.org/10.1300/J082v51n03_04
- Conger, R. D., Elder, G. H., Jr., Lorenz, F. O., Simons, R. L., & Whitbeck, L. B. (1994). *Families in troubled times: Adapting to change in rural America*. Aldine de Gruyter.
- Daoutzis, K. C., & Kordoutis, P. (2023). Gender role conflict, gay identity, relationship love types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in Greek gay men: A path model. *The Journal of Men's Studies, 31*(3), 449–477. <https://doi.org/10.1177/10608265231177432>
- D'Augelli, A. R., Grossman, A. H., & Starks, M. T. (2006). Childhood gender atypicality, victimization, and PTSD among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youth.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1*(11), 1462–

1482.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06293482>
- Downey, G., Feldman, S., & Ayduk, O. (2000).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male violence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7(1), 45–61.
<https://doi.org/10.1111/j.1475-6811.2000.tb00003.x>
- Downey, G., & Feldman, S. I. (1996). Implications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fo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6), 1327–1343.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0.6.1327>
- Downey, G., Freitas, A. L., Michaelis, B., & Khouri, H. (1998).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in close relationships: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rejection by romantic partn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2), 545–560.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5.2.545>
- Doyle, D. M., & Molix, L. (2014a). How does stigma spoil relationships? Evidence that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harms romantic relationship quality through impaired self-image.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4(9), 600–610. <https://doi.org/10.1111/jasp.12252>
- Doyle, D. M., & Molix, L. (2014b).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s a stressor for close relationships: Identifying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pathways.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37(6), 1134–1144. <https://doi.org/10.1007/s10865-014-9563-8>
- Doyle, D. M., & Molix, L. (2015). Social stigma and sexual minorities' romantic relationship functioning: A meta-analytic review.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1(10), 1363–1381.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15594592>
- Dyar, C., Feinstein, B. A., Eaton, N. R., & London, B. (2018). The mediating roles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proximal stress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iscrimination and internalizing symptoms among sexual minority women.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7(1), 205–218.
<https://doi.org/10.1007/s10508-016-0869-1>
- Efron, B. (1967). The two sample problem with censored data. In L. M. Le Cam & J. Neyman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Berkeley symposium on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y, volume 4: Biology and problems of health* (pp. 831–85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rikson, E. H. (1963). *Childhood and society* (2nd ed.). W. W. Norton & Company.
- Feinstein, B. A. (2020). The rejection sensitivity model as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sexual minority mental health.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9(7), 2247–2258.
<https://doi.org/10.1007/s10508-019-1428-3>
- Feinstein, B. A., Goldfried, M. R., & Davila, J. (20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eriences of discrimination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lesbians and gay men: An examination of internalized homonegativity and rejection sensitivity as potential mechanism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80(5), 917–927. <https://doi.org/10.1037/a0029425>
- Feinstein, B. A., McConnell, E., Dyar, C., Mustanski, B., & Newcomb, M. E. (2018). Minority stress and relationship functioning among young male same-sex couples: An examination of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86(5), 416–426.
<https://doi.org/10.1037/ccp0000296>

- Feinstein, B. A., Wadsworth, L. P., Davila, J., & Goldfried, M. R. (2014). Do parental acceptance and family support moderate associations between dimensions of minority stres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lesbians and gay men?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45*(4), 239–246. <https://doi.org/10.1037/a0035393>
- Feldman, S., & Downey, G. (1994). Rejection sensitivity as a mediator of the impact of childhood exposure to family violence on adult attachment behavior.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6*(1), 231–247. <https://doi.org/10.1017/S0954579400005976>
- Fishbein, M. (1963).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eliefs about an object and the attitude toward that object. *Human Relations, 16*(3), 233–239. <https://doi.org/10.1177/001872676301600302>
- Frost, D. M. (2013). Stigma and intimacy in same-sex relationships: A narrative approach. *Qualitative Psychology, 1*(S), 49–61. <https://doi.org/10.1037/2326-3598.1.S.49>
- Garnets, L., Herek, G. M., & Levy, B. (1990). Violence and victimization of lesbians and gay men: Mental health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5*(3), 366–383.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90005003010>
- Gee, G. C., Spencer, M. S., Chen, J., & Takeuchi, D. (2007). A nationwide study of discrimination and chronic health conditions among Asian American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7*(7), 1275–1282. <https://doi.org/10.2105/AJPH.2006.091827>
- Göncü, A., & Sümer, N. (2011). Rejection sensitivity, self-esteem instability, and relationship outcom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s. *European Psychologist, 16*(4), 303–313. <https://doi.org/10.1027/1016-9040/a000066>
- Gottman, J. M., Levenson, R. W., Swanson, C., Swanson, K., Tyson, R., & Yoshimoto, D. (2003). Observing gay, lesbian and heterosexual couples' relationships: Mathematical modeling of conflict interaction.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45*(1), 65–91. https://doi.org/10.1300/J082v45n01_04
- Green, R.-J., & Mitchell, V. (2015). Gay, lesbian, and bisexual issues in couple therapy. In A. S. Gurman, J. L. Lebow, & D. K. Snyder (Eds.), *Clinical handbook of couple therapy* (5th ed., pp. 489–511). The Guilford Press.
- Greene, D. C., & Britton, P. J. (2015). Predicting relationship commitment in gay men: Contributions of vicarious shame and internalized homophobia to the investment model. *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y, 16*(1), 78–87. <https://doi.org/10.1037/a0034988>
- Guyll, M., Matthews, K. A., & Bromberger, J. T. (2001). Discrimination and unfair treatment: Relationship to cardiovascular reactivity among African American and European American women. *Health Psychology, 20*(5), 315–325. <https://doi.org/10.1037/0278-6133.20.5.315>
- Hafen, C. A., Spilker, A., Chango, J., Marston, E. S., & Allen, J. P. (2014). To accept or reject? The impact of adolescent rejection sensitivity on early adult romantic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4*(1), 55–64. <https://doi.org/10.1111/jora.12081>
- Harper, M. S., Dickson, J. W., & Welsh, D. P. (2006). Self-silencing and rejection sensitivity in adolescent romantic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5*(3), 459–467.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06-9048-3>

- Hatzenbuehler, M. L. (2009). How does sexual minority stigma “get under the skin”? A psychological mediation framewor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5*(5), 707–730. <https://doi.org/10.1037/a0016441>
- Herek, G. M., Chopp, R., & Strohl, D. (2007). Sexual stigma: Putting sexual minority health issues in context. In I. H. Meyer & M. E. Northridge (Eds.), *The health of sexual minorities: Public health perspectives on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populations* (pp. 171–208).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https://doi.org/10.1007/978-0-387-31334-4_8
- Hetrick, E. S., & Martin, A. D. (1987). Developmental issues and their resolution for gay and lesbia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14*(1-2), 25–43. https://doi.org/10.1300/J082v14n01_03
- Kamen, C., Burns, M., & Beach, S. R. H. (2011). Minority stress in same-sex male relationships: When does it impact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58*(10), 1372–1390. <https://doi.org/10.1080/00918369.2011.614904>
- Khaddouma, A., Norona, J. C., & Whitton, S. W. (2015). Individual, couple, and contextu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ame-sex relationship instability. *Couple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4*(2), 106–125. <https://doi.org/10.1037/cfp0000043>
- Kurdek, L. A. (1995). 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relationship quality in gay and lesbian cohabiting coupl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1*(1), 86–94. <https://doi.org/10.1037/0012-1649.31.1.86>
- Kurdek, L. A. (1998). Relationship outcomes and their predictors: 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heterosexual married, gay cohabiting, and lesbian cohabiting coupl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0*(3), 553–568. <https://doi.org/10.2307/353528>
- Kurdek, L. A. (2003). Differences between gay and lesbian cohabiting couple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4), 411–436. <https://doi.org/10.1177/02654075030204001>
- Kurdek, L. A. (2008). Change in relationship quality for partners from lesbian, gay male, and heterosexual coupl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2*(5), 701–711. <https://doi.org/10.1037/0893-3200.22.5.701>
- Lau, C. Q. (2012). The stability of same sex cohabitation, different sex cohabitation, and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4*(5), 973–988.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12.01000.x>
- Lazarus, R. S., & Folkman, S. (1984). *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 Lehavot, K., & Simoni, J. M. (2011). The impact of minority stress on mental health and substance use among sexual minority wome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9*(2), 159–170. <https://doi.org/10.1037/a0022839>
- Lehmiller, J. J., & Agnew, C. R. (2006). Marginalized relationships: The impact of social disapproval on romantic relationship commitmen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2*(1), 40–51.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05278710>
- Lewis, R. J., Derlega, V. J., Berndt, A., Morris, L. M., & Rose, S. (2002).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tressors for gay men and lesbian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42*(1), 63–88. https://doi.org/10.1300/J082v42n01_04
- Li, X., Cao, H., Zhou, N., & Mills-Koonce, R. (2021). Internalized homophobia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among same-sex coupl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 68(11), 1749–1773. <https://doi.org/10.1080/00918369.2019.1705671>
- London, B., Downey, G., Bonica, C., & Paltin, I. (2007). Socia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7*(3), 481–506.
<https://doi.org/10.1111/j.1532-7795.2007.00531.x>
- London, B., Downey, G., Romero-Canyas, R., Rattan, A., & Tyson, D. (2012). Gender-based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academic self-silencing in wome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5), 961–979. <https://doi.org/10.1037/a0026615>
- Marston, E. G., Hare, A., & Allen, J. P. (2010). Rejection sensitivity in late adolescence: Social and emotional sequelae.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0*(4), 959–982.
<https://doi.org/10.1111/j.1532-7795.2010.00675.x>
- Maslow, A. H. (1943).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0*(4), 370–396.
<https://doi.org/10.1037/h0054346>
- Mendoza-Denton, R., Downey, G., Purdie, V. J., Davis, A., & Pietrzak, J. (2002). Sensitivity to status-based rejection: Implications for African American students' college experi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4), 896–918.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3.4.896>
- Meyer, I. H. (1995). Minority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in gay men.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6*(1), 38–56. <https://doi.org/10.2307/2137286>
- Meyer, I. H. (2003). Prejudice, social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in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populations: Conceptual issues and research evid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9*(5), 674–697.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29.5.674>
- Meyer, I. H., & Dean, L. (1998). Internalized homophobia, intimacy, and sexual behavior among gay and bisexual men. In G. M. Herek (Ed.), *Stigma and sexual orientation: Understanding prejudice against lesbians, gay men, and bisexuals* (pp. 160–186). SAGE Publications.
<https://doi.org/10.4135/9781452243818.n8>
- Mohr, J. J., & Daly, C. A. (2008). Sexual minority stress and changes in relationship quality in same-sex couple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5*(6), 989–1007.
<https://doi.org/10.1177/0265407508100311>
- Mohr, J. J., & Fassinger, R. E. (2006). Sexual orientation identity and romantic relationship quality in same-sex coupl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2*(8), 1085–1099.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06288281>
- Moskowitz, D. A., Rieger, G., & Roloff, M. E. (2010). Heterosexual attitudes toward same-sex marriage.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57*(2), 325–336. <https://doi.org/10.1080/00918360903489176>
- Neff, L. A., & Karney, B. R. (2004). How does context affect intimate relationships? Linking external stress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within marriag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0*(2), 134–148.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03255984>
- Norona, J. C., & Welsh, D. P. (2016).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in dating relationships: The mediating role of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Couple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search*

- and Practice*, 5(2), 124–135. <https://doi.org/10.1037/cfp0000056>
- Otis, M. D., Rostosky, S. S., Riggle, E. D. B., & Hamrin, R. (2006). Stress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in same-sex couple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3(1), 81–99. <https://doi.org/10.1177/0265407506060179>
- Pachankis, J. E., & Goldfried, M. R. (2006). Social anxiety in young gay men.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0(8), 996–1015. <https://doi.org/10.1016/j.janxdis.2006.01.001>
- Pachankis, J. E., Goldfried, M. R., & Ramrattan, M. E. (2008). Extension of the rejection sensitivity construct to the interpersonal functioning of gay me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6(2), 306–317. <https://doi.org/10.1037/0022-006X.76.2.306>
- Pachankis, J. E., Hatzenbuehler, M. L., & Starks, T. J. (2014). 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al stigma and rejection sensitivity on young sexual minority men’s daily tobacco and alcohol use.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03, 67–75. <https://doi.org/10.1016/j.socscimed.2013.10.005>
- Pachankis, J. E., Rendina, H. J., Restar, A., Ventuneac, A., Grov, C., & Parsons, J. T. (2015). A minority stress—emotion regulation model of sexual compulsivity among highly sexually active gay and bisexual men. *Health Psychology*, 34(8), 829–840. <https://doi.org/10.1037/hea0000180>
- Paradies, Y. (2006).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self-reported racism and heal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35(4), 888–901. <https://doi.org/10.1093/ije/dy1056>
- Pascoe, E. A., & Smart Richman, L. (2009).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health: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5(4), 531–554. <https://doi.org/10.1037/a0016059>
- Pepping, C. A., Cronin, T. J., Halford, W. K., & Lyons, A. (2019). Minority stress and same-sex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The role of concealment motivation. *Family Process*, 58(2), 496–508. <https://doi.org/10.1111/famp.12365>
- Preacher, K. J., & Hayes, A. F. (2004). SPSS and SAS procedures for estimating indirect effects in simple mediation model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Instruments, & Computers*, 36(4), 717–731. <https://doi.org/10.3758/BF03206553>
- Richter, M., & Schoebi, D. (2021). Rejection sensitivity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mplications for 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Zeitschrift für Psychologie*, 229(3), 165–170. <https://doi.org/10.1027/2151-2604/a000448>
- Rohner, R. P. (2004). The parental “acceptance-rejection syndrome”: Universal correlates of perceived reje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9(8), 830–840.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9.8.830>
- Romero-Canyas, R., Downey, G., Berenson, K., Ayduk, O., & Kang, N. J. (2010).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the rejection–hostility link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8(1), 119–148.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94.2009.00611.x>
- Rostosky, S. S., & Riggle, E. D. B. (2017). Same-sex relationships and minority stres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3, 29–38. <https://doi.org/10.1016/j.copsy.2016.04.011>
- Rostosky, S. S., Riggle, E. D. B., Gray, B. E., & Hatton, R. L. (2007). Minority stress experiences in committed same-sex couple relationships.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38(4),

- 392–400. <https://doi.org/10.1037/0735-7028.38.4.392>
- Safren, S. A., & Pantalone, D. W. (2006). Social anxiety and barriers to resilience among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adolescents. In A. M. Omoto & H. S. Kurtzman (Eds.), *Sexual orientation and mental health: Examining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in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people* (pp. 55–71).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ttps://doi.org/10.1037/11261-003>
- Salvati, M., Piumatti, G., Giacomantonio, M., & Baiocco, R. (2019). Gender stereotypes and contact with gay men and lesbians: The mediational role of sexism and homonegativity.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9(6), 461–473. <https://doi.org/10.1002/casp.2412>
- Sánchez, F. J., & Vilain, E. (2012). “Straight-acting gay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culine consciousness, anti-effeminacy, and negative gay identity.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1(1), 111–119. <https://doi.org/10.1007/s10508-012-9912-z>
- Schmitt, M. T., Branscombe, N. R., Postmes, T., & Garcia, A. (2014). The consequences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0(4), 921–948. <https://doi.org/10.1037/a0035754>
- Sneed, J. R., Johnson, J. G., Cohen, P., Gilligan, C., Chen, H., Crawford, T. N., & Kasen, S. (2006).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age-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rumentality and family contact in emerging adulthoo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2(5), 787–797. <https://doi.org/10.1037/0012-1649.42.5.787>
- Song, C., Buysse, A., Zhang, W.-H., & Dewaele, A. (2022).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mong same-sex couples: The role of dyadic stress and sex. *Journal of Sex & Marital Therapy*, 48(6), 567–578. <https://doi.org/10.1080/0092623X.2021.2022048>
- Spanier, G. B. (1976). Measuring dyadic adjustment: New scales for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marriage and similar dyad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8(1), 15–28. <https://doi.org/10.2307/350547>
- Spanier, G. B., & Cole, C. L. (1976). Toward clarifica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marital adjust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the Family*, 6(1), 121–146.
- Stuber, J., Meyer, I., & Link, B. (2008). Stigma, prejudice, discrimination and health.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7(3), 351–357. <https://doi.org/10.1016/j.socscimed.2008.03.023>
- Szymanski, D. M. (2006). Does internalized heterosexism moderate the link between heterosexist events and lesbian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Sex Roles: A Journal of Research*, 54(3-4), 227–234. <https://doi.org/10.1007/s11199-006-9340-4>
- Szymanski, D. M., Ikizler, A. S., & Dunn, T. L. (2016). Sexual minority women’s relationship quality: Examining the roles of multiple oppressions and silencing the self. *Psychology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Diversity*, 3(1), 1–10. <https://doi.org/10.1037/sgd0000145>
- Todosijevic, J., Rothblum, E. D., & Solomon, S. E. (2005).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ffectivity, and gay-specific stressors in same sex-couples joined in civil union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9(2), 158–166. <https://doi.org/10.1111/j.1471-6402.2005.00178.x>
- Trettin, S., Moses-Kolko, E. L., & Wisner, K. L. (2006). Lesbian perinatal depression and the heterosexism that affects knowledge about this minority population. *Archives of Women’s Mental Health*, 9(2),

67–73. <https://doi.org/10.1007/s00737-005-0106-8>

Volz, A. R., & Kerig, P. K. (2010). Relational dynamics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 dating violence: The roles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relational insecurity. *Journal of Aggression, Maltreatment & Trauma, 19*(6), 587–602. <https://doi.org/10.1080/10926771.2010.502088>

收稿日期：2023 年 05 月 03 日

一稿修訂日期：2023 年 05 月 22 日

二稿修訂日期：2023 年 08 月 07 日

三稿修訂日期：2023 年 10 月 05 日

四稿修訂日期：2023 年 11 月 23 日

五稿修訂日期：2024 年 02 月 05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4 年 02 月 16 日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24, 55(4), 767–794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Mediating Effect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Relationship Adjustment in Same-Sex Couples

Yu-Sheng Wang¹ and Yen-Chun Liu²

The lesbian gay bisexual (LGB) community continues to face various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in daily life. Meyer's (2003) minority stress model and Hatzenbuehler's (2009) psychological mediation framework suggest that societal oppression exposes this community to persistent stressors, increasing awareness and sensitivity on discrimination and threat. This phenomenon raises concerns regarding personal effects and potential harm, which may deteriorate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of LGB individuals. Consequently, these individuals deliberately conceal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for self-protection, further internalizing homophobia.

Throughout their development, LGB individuals often face rejection and neglect, which leads to rigid and irrational patterns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Such experiences also increase the rejection sensitivity of LGB individuals (Downey & Feldman, 1996), making them prone to perceiving others as harboring malicious intentions. This perception triggers intense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responses that negatively affec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Rohner, 2004). Furthermore, excessive self-monitoring, heightened sensitivity to stigma, increased social anxiety, and fear of evaluation are prevalent in this community (Feinstein, 2020; Mendoza-Denton et al., 2002; Pachankis et al., 2008; Safren & Pantalone, 2006). Although rejection sensitivity can prompt vigilance against threats, constant vigilance may obscure other safety signals, thereby affecting the mental and emotional health of LGB individuals (Romero-Canyas et al., 2010).

External pressure and high rejection sensitivity cause LGB individuals to fear criticism and judgment.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reluctance to disclose sexual orientation or acknowledge relationships may impair trust and commitment (Mohr & Fassinger, 2006; Rostosky & Riggle, 2017). Moreover, the focus on external threats often leads to disproportionate negative interactions and attitudes compared with the efforts invested (Feinstein et al., 2018; Li et al., 2021; Pepping et al., 2019). Fear of abandonment or rejection in conflicts can result in self-silencing, emotional withdrawal, or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escalating disputes and undermining relationship adjustment (Norona & Welsh, 2016; Volz & Kerig, 2010). Because of their high sensitivity to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and changes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women may be more susceptible than men to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stress (Cao et al., 2017).

When stigmatized persistently, LGB individuals may develop an anticipatory expectation of rejection in social interactions. This increases their rejection sensitivity, reducing their self-worth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abilities (Bungert et al., 2015; Göncü & Sümer, 2011; Pachankis et al., 2015).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high rejection sensitivity can exacerbate stres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the face of external discrimination, adversely affecting the relationship through spillover effects and poor self-regulation abilities.

¹ Counseling Section, National Nanke International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²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University of Taipei

Corresponding author:

Yen-Chun Liu,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University of Taipei. Email: yenliu@utapei.edu.tw

In this study, we tested the following hypotheses: H_1 :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rejection sensitivity in the LGB community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H_2 :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in the LGB community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relationship adjustment; H_3 : Rejection sensitivity in the LGB community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relationship adjustment; and H_4 : Rejection sensitivity in the LGB community has a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relationship adjustment.

In this study, a survey conducted among Taiwanese LGB individuals (aged ≥ 20 years) who had been in same-sex relationships for > 3 months yielded 293 valid responses. The study sample comprised 117 male individuals (101 gay and 16 bisexual) and 176 female individuals (92 lesbian and 84 bisexual). The mean age was 28.1 ± 5.53 years, and the average relationship duration was 42.1 (men: 42.2; women: 42.0) months. The following instruments were used: A basic information form, the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Scale, the Rejection Sensitivity Questionnaire, and the Dyadic Adjustment Scale. Given that the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Scale was newly developed for this study and that the Rejection Sensitivity Questionnaire and Dyadic Adjustment Scale had not been previously applied to the Taiwanese LGB community, we conducted preliminary tests, item analyses, an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ssessments for these scales. All scales exhibited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is study yielded four main findings. First, the male participants more frequently experienced discrimination in daily life than did the female participants. Furthermore, the female participants outperformed the male participants in relationship adjustment. This discrepancy is attributed to stricter societal expectations and greater scrutiny of gender expression in male individuals than in female individuals; these factors contribute to elevated levels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in male individuals (Moskowitz et al., 2010). Regarding relationship adjustment, gender dynamics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yielded distinct interaction patterns. Specifically, compared with the female participants, the male participants required more time to repair relationships and tended to be more likely to withdraw or avoid conflict resolution behaviors (Khaddouma et al., 2015). This explains the improved relationship adjustment among female same-sex couples.

Seco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noted between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rejection sensitivity across genders. This finding suggests that discrimination-related experiences are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individuals' internal working models, prompting individuals to activate their self-protective mechanisms in general interactions. This integration leads to heightened anxiety and a predisposition to anticipate rejection, ultimately increasing rejection sensitivity (Dyar et al., 2018).

Third, among the female participants, lower levels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rejection sensitivity were associated with better relationship adjustment. However, no such association was noted among the male participants. This discrepancy may be attributable to female individuals' increased sensitivity to changes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their high susceptibility to stress on mental and physical well-being, and their tendency to exhibit self-silence or withdrawal behaviors, which can make relationships challenging to maintain and negatively affect relationship adjustment (Richter & Schoebi, 2021).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relationship adjustment may vary depending on factors such as between-partner trust levels, relationship patterns, attitudes toward relationships,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strategies (Ayduk et al., 2008, as cited in Romero-Canyas et al., 2010; Daoultzis & Kordoutis, 2023; Kamen et al., 2011; Song et al., 2022).

Finally, in the female participants, rejection sensitivity mediat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relationship adjustment. This mediation effect was not observed in the male participants. This discrepancy may be attributable to the dual pressures of heterosexual dominance and patriarchy, which can make female LGB individuals, particularly those with high levels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feel undervalued. In cases involving rejection or conflict, female LGB individuals may resort to silent endurance or sacrifice and be reluctant to express themselves, complicating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and compromis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Szymanski et al., 2016; Trettin et al., 2006). Although we did not investigate discrimination experiences in individuals stratified by gender, the effect of heteronormativity on the LGB community is apparent. The detrimental effect of patriarchy on female LGB individuals warrants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is study has several limitations. For example, we could not assess the experiences of LGB individuals who conceal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because of a fear of discrimination. Furthermore, life experiences of LGB individuals, states of interaction, or internalization of homophobia may influence evaluations and attitudes of individuals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Therefore, future studies should include dyadic analyses to clarify the interaction processes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same-sex relationships.

In conclusion, practitioners working with the LGB community should incorporate rejection sensitivity into their frameworks in counseling and education. This integration may help comprehend the community's heightened vigilance toward external

stimuli and support LGB individuals in recognizing societal oppression. Furthermore, an environment that celebrates diversity should be created for these individuals. Achieving this goal necessitates concerted societal efforts.

Keywords: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rejection sensitivity, relationship adjustment, same-sex couple

